

观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问题

WILLIAM EASTERLY

在我的发展生涯中，我发现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是，任何讨论都必须导致立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否则就会被视为无关紧要。（作者是根据经验说的--我最近一本书的评论员对“缺乏明确的建议”感到震惊。）当然，坚持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面对贫穷、饥饿和可预防的死亡等悲惨问题时，任何不强调立即行动的做法都显得无情。

然而，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有帮助。这种方法至少有三个主要谬误。第一，对问题的回答确实会导致行动；第二，“我们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人选；第三，行动建议是促使进步的唯一途径。第三种谬论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不管“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方法出了什么问题，反正进步正在发生！”。

联合国在2015年9月宣布的2030年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就是这些谬论的一个长达35页的冗长广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部意义--在169个目标中得到进一步阐述--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像选美选手对世界和平的呼吁一样，很可能导致进步。

联合国宣言的开篇摘要很折磨人，它立即暗示了行动计划导致行动的谬误。它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关于“综合和协调地执行和跟进联合国的成果”。

WILLIAM EASTERLY 是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发展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最近的著作是《专家的暴政》（The Tyranny of Experts）。经济学家、独裁者和被遗忘的穷人的权利》（Basic Books, 2014）。

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联合国术语的翻译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摘要建议采取的行动，在以前的许多联合国首脑会议上被建议后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文件本身列出了两个先前的联合国会议，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为什么行动计划不会产生行动？嗯，行动要求至少有人注意到行动计划。我们这些在自己圈子的发展人士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抓住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其他主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纽约时报》网站上，2015年10月初的一次搜索发现，关于布基纳法索这个小国的报道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倍多，即使教皇弗朗西斯和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发表了讲话。泰晤士报的编辑们显然认为，他们的读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的兴趣不如对布基纳法索以民主取代专制统治者的斗争的起伏感兴趣。

甚至更少注意到以前的.....。众多行动计划草案最终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几乎没有人关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2013-14年的13次会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谈判的利益攸关方筹备论坛，以及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请不要让我解释这些小组中的任何一个。我已经在与一位联合国高级顾问的会议上出了洋相，把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和开放工作组混淆了。

并非只有联合国在制定行动计划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世界银行宣传自己是行动建议的“知识银行”。然而，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世界银行充满此类建议的"知识产品"中，有31%从未被下载，87%从未被引用。

转义条款

即使有人注意到你的行动计划，仍然必须有一种方法来激励行动者采取行动。这给我们带来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一思维模式背后的第二个谬误--谁是这个"我们"，"我们"是正确的行动者吗？通常的答案会导致动机薄弱的行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我们"是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我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声明吹嘘说："世界领导人从未在如此广泛和普遍的政策议程上承诺采取共同行动和努力"。但是，同意这一共识的领导人数量越多，任何具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从普京到巴沙尔-阿萨德再到金正恩，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可以否决这一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多少有效的行动是可能的？他或她没有的任何行动

喜欢吗？这种对共识的需求可能是造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很多模糊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的原因。

如具体目标3.8："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实现全民医保。

包括金融风险保护，获得高质量的基本保健服务，以及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和疫苗。这是一个没有人会反对的神奇目标，但也是一个没有人期待会实现的目标。

所有193位领导人都能同意的一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约束。丰富的免责条款是以尊重的语言来伪装的。签署国承诺"尊重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我们在第55段中得知，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期望性的"，"每个政府都要制定自己的国家目标"。如果你仍然不明白这一点，目标17.15是"尊重每个国家的政策空间和领导权"--也就是说，对于其他168个目标，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即使有任何真正的承诺，对

每个农民的回报。可持续发展目标延续了联合国的一个古老传统，即没有人单独对任何一项行动负责，但所有领导人、联合国机构、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以及众多其他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行为者都对所有成果负有集体责任。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以前的联合国峰会留下了那么多未兑现的承诺，需要在SDG峰会上重新确认，包括SDG的前身--

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我们再次承诺全面实现.....偏离轨道的千年发展目标"，即那些未能在2015年目标日期前实现的目标，如那些

"与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以及生殖健康有关的目标"。

至少，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更普遍的联合国"我们"。

这比另一个常见的"我们"的定义要好得多--西方的救世主问

"我们应该怎么做？"关于其他地区无助、被动的受害者。千年发展目标

"的努力，是对西方国家的黄金

诸如Bono、Bob

Geldof、Tony等西方救世主的时代。

布莱尔、杰弗里-萨克斯和比尔-

盖茨。也许高潮（或低潮）是2005年的Live

8音乐会。

nized by Geldof and Bono to motivate the Blair-hosted

如果在清单上没有任何行动，集体责任就无法激励这些行动的发生--

就像集体耕作在努力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进展的可能性

就像选美选手对世界和平的呼吁一

样。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增加西方援助，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该音乐会的标志是一个憔悴的非洲儿童。今天，人道主义广告中有辱人格的非洲儿童形象更有可能被贴上 "贫困色情" 的标签。有一点意识到，穷人更有可能自救，而不是被中年白人男性专家所救。

被低估的理想

我提到的第三个谬论是，行动计划是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理想的传播是一种被大大低估的进步方式，例如在走向种族或性别平等方面。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最著名的演讲不叫 "我有一个计划"。"人人生而平等" 这一理想的传播推动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结束。尽管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令人沮丧，但全球民主传播的长期趋势是积极的。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人们在尝试失败后并没有放弃。在他们2015年出版的《非洲起义》中。大众抗议

在《政治变革》一书中，Adam Branch和Zachariah Mampilly列出了过去十年中四十个非洲国家的九十多起政治抗议活动。正如《纽约时报》在过去一年对布基纳法索的一场民主运动的报道一样，穷人自己的政治抗议活动吸引了西方新闻读者的注意力，远远超过了像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样的联合国行动宣言的言辞。而这些努力也在逐渐发挥作用。今天的非洲，像伊迪-阿明和蒙博托-塞塞-塞科这样可怕的卡通小人专制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政府面临竞争性选举。经济自由的理想在全世界的传播是一种更被低估的进步方式。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发展中世界的许多政府利用利率管制、高通货膨胀、不切实际的官方汇率以及对买卖外汇的控制来征用储蓄者和出口商，使穷人和富人都受到伤害。在过去的15年里，这些侵犯经济自由的行为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了，部分原因是西方和美国的经济学家都在争论。

休息，反对这种自我毁灭的政策。

因此，尽管重复的联合国行动计划没有效果，但个人、企业家。

发展中国的活动家们享有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以获得他们自己的成功。自2000年以来，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高收入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增长。在新的千年里，贫穷国家还有其他更具体的成功迹象，如非洲手机使用量的爆炸性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和移民汇款的激增。六十多年来，无论联合国不具约束力的集体行动承诺如何变化，清洁水、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长期积极趋势一直保持稳定。

"我们应该怎么做？"行业并不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很快就会倒闭。它让我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有事可做，让政治家们有事可推荐。更为积极的是，它确实吸引了那些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利他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即行动计划不一定会导致行动，"我们"不一定是正确的行动者，还有其他的进步途径。全球进步与倡导人类自由的理想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与行动计划有很大的关系。 ■